

湖畔栽梅意近禅
一花虚实两花看；
戏中画外皆如此，
天地多情助苦寒。

默写苦寒斋主人梅阉师

海韵 草草



• 传略 •
创作谈

陈谷子烂芝麻

梅 阡

（一）海河情思

我出生在天津。我是喝海河水长大的。从 1937 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离开天津，便很少回来。有时回来也只作极短暂的停留。然而对故乡的情思却时时萦回胸臆。每当回忆起来，对这条河水常寄有深情。记得我幼年在河东的陋居是没有安装自来水的。由推起来吱吱哑哑的水车给每家居民送水。水车在深巷里缓缓走过，发出寂寞而单调的旋律。水缸里要放些明矾，经过搅动，使水里的泥沙杂质沉淀才能饮用。然而在记忆中，故乡的水还是甜的。

当我漫步在海河边上，便想起这是我儿时垂钓之地，油然记起六十余年前的情景。那是严冬腊月，在海河的一个支叉上，破冰垂钓。朔风野大，双手冻得通红，而钓兴不减。钓的是海河的特产“银鱼”。据说，只有在望海楼三条河水汇流处的附近才能钓到它。那鱼是白色无鳞的细条，蘸些面糊用油炸来吃，味道无比鲜美。迄今思之尤觉口颊留芳。这条河汉如今也失其所在，铺成宽阔的马路了。

我读书的天津市立师范中学（原特二区三马路口）新建

的校舍就在金汤桥附近的海河边上。从教室临窗外望，片片白帆在蓝天下悠然飘过。瞩目凝望，引起遐思。记得先伯祖梅小树曾为天津鼓楼书撰的一幅楹联的上句：“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也不禁引吭高吟。想着大约半个多世纪以前，天津这块地方还是沟汊纵横一片荒芜的沙滩吧。沧海桑田，感到时代前进的脚步是永不停歇的。那时我曾编辑了一册文艺刊物，即取名作《白帆》。

就在这个学校，培养了我对戏剧的爱好。启蒙的老师是张鸣岐先生，他曾随熊佛西在定县搞农村戏剧运动。那时师生组织的孤松剧团曾上演过《北国之夜》、《父归》等独幕剧。1935年的暑假我们排演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这是个大胆的尝试。天气闷热，人人挥汗如雨，表现了年轻人对戏剧的狂热。记得在第三幕时，曹禺同志在后台教给我们用田径运动用的铅球在后台地板上滚来滚去，造成由远而近的雷声效果。一次与曹禺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这可能是《雷雨》在全国的第一次的上演。想起这些，我也仍然感到内心的激动。

1937年秋我离开天津时是个没有月色的黯夜。就在紫竹林太古码头乘上驳船，冒险驶向大沽口，换乘巨轮。那是天津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的民族屈辱的日子，也是奋起全民抗战的日子。几百人的驳船上，黯然无声，只听得河水潺潺。别了，故乡……看着“万国桥”（这也是个屈辱的名字，如今叫解放桥了）黑压压的影子，逐渐的远了，远了……那白河潺潺流淌的声音似乎还萦回耳际，它像奏着一曲幽咽而悲愤的曲子在向我送别。

今天，当我漫步在海河边上，这些前尘往事，使我浮想联翩。而我今天面对的却是修砌得整洁的堤岸，再不见那一堆堆的垃圾。十里长堤成为逐渐绿化的海河公园。广场上喷泉的水柱，被灯光照耀得辉煌而绚丽，孩子们一张张的笑脸也映着青春的光彩。这正是人民城市的春天。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望着这缓缓流动的河水，使我回忆许多片片段段幼年时的往事。

（二）尊 师

1929 年我毕业于天津河东大佛寺小学。北伐胜利后改名为市立第二十六小学。校舍是一座古庙改建的。教室和院子都很破旧。今天回想起来，活跃在我记忆中的是那些默默奉献，殷勤执教的老师们。小学教师是最清苦的行业，又肩负着百年树人的重任，今天，国家把 9 月 10 日定为教师节 提倡尊师重教的学风，使教师工作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是值得赞许的。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我的国文老师。

时隔 60 多年了，他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姓王，名字不记得了。当时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是不大记老师的名字的。那时，他已 50 多岁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纹路很深，人也干瘦，显得比他年龄更加苍老和衰弱。冬天，永远穿着一袭臃肿的灰布棉袍，那棉袍的胸襟和袖口上带着明显的磨得发亮的油迹，是多年不曾拆洗的了。他精神有时激越，有时又似乎很颓唐。孤单单一个人住在学校一间阴暗的小平房里。那间狭隘的斗室，为了批改作业我也常去，虽然屋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雾和霉味，我仍愿与他接近，有时

还为他做些打开水、铲煤球、买香烟之类的杂事，这也是“弟子服其劳”吧。

当“堂役”在院里摇铃上课的时候，他总是踩着铃声慢吞吞踱进教室。有时那一袭臃肿的灰布棉袍和钻进教室的学生在门口挤在一起，他是从不迟到一分钟的。那时我是个班长，上课后总要喊“起立！”“坐下！”这是机械的例行公事，而他却透过深度的近视镜，向学生们溜览一过，笑嘻嘻地点点头，使人感到温善而亲切。按规矩每天第一堂课老师总是要照册点名的，一个个呼叫同学的名字，同学要回答“有！”或“到！”。这样就不免要磨蹭掉几分钟。而他是从不点名的，大约是为了节约教学时间吧。有时调皮的同学提醒他：“老师，点名！”他却摇摇头说：“我们是照大学堂的规矩哩，来去自便啊！”一句笑话，同学们就都肃然了。有时他也讲些故事和典故，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所以他虽不严厉，而班上的秩序井然。他对教学是十分认真的，常常选些课本以外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一次，他从《古文观止》里选了篇《吊古战场文》，油印了发给同学们，是他亲手刻版的，一笔一画的楷书，写得十分工整。他常常动员同学们练小楷，说：“这是敲门砖啊，将来谋差事，写履历片，字写得好，占便宜啊！”这种印刷的履历片今天很难看到了，大约早进了古物陈列馆了吧，对这篇《吊古战场文》同学们不大感兴趣，他的讲解也听不大明白。他便说：你们先死背下来，将来慢慢会懂的，像牛吃草一样反刍。跟着我念！……他便带着朗诵起来：“浩浩乎平沙无垠，杳不见人……”看他摇头晃脑，似乎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之中，同学们也学着那略带异乡的口音，一句句地跟

着摇头晃脑，这时教室里似乎充满了一种美的音乐旋律。

他从不发脾气，有一次却发了脾气。他来到教室，脸板板的，不再见那嘻嘻的笑容。登上讲台，他环顾左右，大声地：“椅子呢？”然后把挟着的书本和名册狠狠地一摔，又喊了一句：“椅子呢？”同学们都愣了，我战战兢兢地起立回答：“校长叫堂役搬走了。”原来，那时讲桌旁是为老师设置了一把椅子的，他也并不常坐。那正是北伐胜利不久，天津赶走了张宗昌、褚玉璞之类的北洋军阀。学校换了个穿黑中山装的新校长，小学似乎也要进行一些“改革”吧，以显示一点维新与“革命”的气象。而“改革”的第一项就是搬走教室里老师们的坐椅。这事本来他早就了然的，他却憋着到班上 come 发脾气。但他的所谓脾气，也就是这么大声地喊了两句“椅子呢？”他不再言语了，也不讲课，掏出香烟来吸着。他抽的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低档货“海盗牌”。他点烟的火柴梗从来 not 扔在地上，而是习惯地放到黑板下面的粉笔灰槽里。有时一堂课下来，槽里会积下五六支火柴梗和烟蒂头。他吸着烟，慢慢踱到窗边，朝窗外望着。窗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鹅毛大雪，他望着雪花，默无一言，同学们也鸦雀无声。教室里很静，静得似乎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足有一支烟的工夫，他才把烟头熄掉，轻轻地说了一句：“慢慢恐怕连烟也不许吸的！”他慨然，走到讲桌前说：“上课吧！”但他并没有讲课，却是发牢骚，发那搬掉老师椅子的牢骚。他从“杏坛设教”讲起，直到指着窗外白茫茫的大雪，讲了“程门立雪”的故事，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有些我们也听不太懂。但我记住了他最后的话：“你们要好好的学啊，学本事，将来切莫作小儿王，

莫坐冷板凳，……今天连冷板凳也没得坐了……”我看他眼里似乎还闪着泪花。诉说他过去也干过科员科长一类的差事，后来不知怎么混成了小学教员，而且孤单单一个人流落在异乡天津。大约由于椅子的事触动了他历经沧桑，身世坎坷的伤感吧。

事后不久，在一次自己选题的作文里我写了篇作业，题目是“对国文教学的商榷”。这大约也是受了新校长的“口谕”鼓励同学们给老师提意见吧。不久他就把我叫到那间充满烟雾与霉味的斗室里。我想大约又是为了批改国文作业吧，这是常有的事。记得一次他把我的作文用毛笔小楷批改得密密麻麻，除了几个画圈的句子外，原作保留无几了，文章也几乎长了一倍，面目全非了，他仍叫贴在教室里作为“示范”。使我感到受鼓励后，有点欣喜也有点自愧。这次，一进门，我就看到桌上我那篇作文在题目‘商榷’两个字旁打了个黑杠。他说：“这个题目很不好。我是不反对给老师提意见的。譬如，我上课吸烟应当自己带个烟缸什么的……但是你明白‘商榷’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看他那严肃的神态，我摇摇头，心想，我是看报上用，觉得新鲜抄来的。他说：“‘商榷，两个字见于南北朝梁史的注文。是‘谈论古今、兼以嘲谑’的意思，你难道要嘲谑老师吗？……要懂得尊师啊！……”他又是滔滔不绝，当时我确实感到异常惶惑，但事后想来，这也是他那牢骚的借题发挥吧。

小学毕业后我再没见过他，断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失业了，很落魄，也没回到他的故乡，就在街头摆个代写书信的摊子，混饭吃。不久，孤苦而凄凉地死在南市一个小鸡毛店

里。

许多年来他生活在我的记忆里。今天，他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花白的短平头，那削瘦的面容，那一袭臃肿的灰布旧棉袍，和他那站在讲台上笑嘻嘻的一点头……

（三）鼓楼上的一副楹联

天津旧时是有城墙的，但城区不大，东西南北各长两华里左右。城墙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拆了，城基辟成了东、西、南、北四条马路，比利时人在天津创办了电车公司，其白牌电车就是围城转的。城的中心有一座鼓楼。在我离开天津前它依然矗立着。由于阻碍交通，解放后也拆平了。天津有个儿歌：“天津卫，有三宝，鼓楼、炮台、铃铛阁。”我儿时就唱过。据说这鼓楼是明成祖设“天津卫”时修建的，也有近 600 年的历史了，算个古建筑。有考古癖的老乡亲们，对此深表惋惜，大约是不能藉以引发思古之幽情吧。其实我以为：只着眼于我们历史的悠久与前人事业的辉煌，而忘记八国联军入侵之耻与近代的积弱的人们是不大有出息的。因之，我不太注意去追寻我的家史和先人们的业绩，我以为他们纵或有些许显赫的光彩也贴不到我的脸上来。

鼓楼上有一副楹联，大约是清代重修时配置的。其文曰：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梦醒，听百零八杆早晚钟声。

楹联的撰书者署名梅小树。

有位老乡亲曾经问我：你们梅家过去几代文风很盛。梅

小树是你什么人呢？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开玩笑地说：这倒要查查家谱了。

谈到家谱是我在天津沦陷后，离开天津时奉先父之命带到安庆的。先父的信中说（当时我只一人留在天津），你什么都可以舍弃，必须把家谱和那部手抄本《欲起竹间楼诗集》带出来交给你在安庆的大哥，不能数典忘祖啊。……那时这事是相当冒险的，在码头上若被日军搜查发现，便会被推入另一行列，不能上船，其命运便不可知了。抗战胜利后见到我的大哥，谈起此事，他极为懊悔，说在安庆沦陷逃往庐山时把那套家谱和诗集埋在地下，几年后刨出来，已烂成一堆腐泥了。

不能“数典忘祖”这也是先父的遗训吧。对于家史我的孩子们有时也说：“我们也想知道知道。”然而我了解的也不多，只简略从高祖谈起吧。

高祖梅履端，终身布衣，擅长书画，在天津博物馆我曾见到过他的四幅花卉条幅。他生前畅游大江南北，颇负盛名。

曾祖父梅成栳（1775—1844 年），字树君，号吟斋，斋名“欲起竹间楼”，弱冠补诸生（即秀才）嘉庆五年中举。他出自清著名诗人张问陶（张船山）的门下，与诗人崔旭时称“畿南二俊”。他曾在天津水西庄创立“梅花诗社”，并创立“辅仁书院”，担任主讲。当时中了秀才的穷读书人都可以向书院每月交两篇文章，领一些膏火费即灯油钱。这样天津的举人秀才多出自他的门下。所著有《四书讲义》二卷，《吟斋笔记》四卷，《欲起竹间楼诗文集》四卷等。这就是我冒险带到安庆去的那部手抄本。他生前未曾刻印，是他亲笔用小楷

书写的，值得珍贵。他与崔旭合刻的《畿南二俊诗集》在天津还能找到。我偶翻天津出版的文史资料，曾刊载了他十几篇歌咏津门风物的诗：

游海光寺

日暮凭栏感旧游，夕阳无语下沧洲，
萧萧芦荻疑风雨，满浦秋声抱一楼。

河楼春望

萋萋芳草望如烟，沽上潮来水拍天，
出网河豚三月美，桃花红映酒家船。

他的夫人金沅，号问陶女史，也是诗人，遗作有诗集《问梅小草》也摘录一首《晓起》：

碧窗初卷透春寒，料峭东风翠袖单，
昨夜海棠经雨放，一枝红玉压栏杆。

我的祖父叫梅宝辰，字鹤仙，是清末科的副榜，主讲天津会文书院（在天津东北角崇文宫旧址）也是个著名的诗人、画家。天津的朋友陈云君曾送给我一幅他家藏的鹤仙公的条幅，我至今保存着。那位为天津鼓楼撰写楹联的梅小树是祖父的四胞兄，是我的伯祖父。

到我父亲这一代就念洋学堂了。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没有拿到文凭的第一期毕业生。所以没有拿到文凭，是因为他毕业那年东北正流行鼠疫，毕业生都派赴东北实习，参加防治鼠疫工作，有一定危险。父亲是继配先祖母的独子，舍不得叫他去，于是学校扣发了文凭，这与我父亲的一生坎坷是颇有关系的。

文化大革命时小将们有一句口号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也是某些高干子弟们依仗父母的余荫而自抬身价。这个血统论早就批臭了，我这“臭老九”的子弟是属于“黑七类”的。我的先世没什么龙凤，只是些清贫的读书人而已。所谓“书香门第”，过去写材料也不敢提，既没有什么光彩，反而容易招来极左路线下的阶级斗争的是非。但是认真想来这个家世，对我的喜爱文艺有一些孕育与影响的。

（四）七老太太

我出生在天津河东吉家胡同的一个杂院里，赁居两间西房。母亲说你的“衣胞”就埋在院子的南墙根下。这应该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胡同是接连粮店街的一条狭长的陋巷，它在我记忆中已经十分淡漠了。想起来有点印象的是我常穿着夏布长衫，夹着书包上学的情景。夏布是出产于湖南浏阳一带的麻质的手织布匹，今天已不多见了。母亲把它浆洗得很平整，见楞见角，上学穿，回家便须脱下挂起来。我是不情愿穿的，小学生穿长衫在当时也是个少见的事儿，走在路上常遇到诧异的眼光。母亲说这样可以使得你行动规矩些，不乱跑乱闹，滚得像个泥猴儿。我想她老人家也许有自诩为读书人家，有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心理吧。

对这条胡同我再有的印象，便是一个当铺，大约叫“天丰当”吧，那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还有一个叫一品香的茶食店，每当我揣着半个窝头去上学时，路过店外，望着里边陈列的蛋糕之类，时有馋涎欲滴之感。这时，母亲的声音在

耳边响起：“书念好了，将来吃香的喝辣的。”于是我便也释然，顺着胡同向学校走去。

令我印象深刻，而怀念不已的却是寄居在外公吴家老宅的那几年，特别怀念的是那位 70 多岁有点精神病的七老太太。

七老太太是个没儿没女没一个亲人的老寡妇。一头银发，面容瘦削，高高的鼻梁，弯弯的凤眼，加上白皙的皮肤，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极其俊俏的美人。70 多岁了还很好修饰打扮，每天早晚例行的坐在镜台前磨蹭半天，描眉理鬓。她衣服穿得极其整洁，好穿浅颜色的衣裳。冬天的棉袄也是银灰色的，看起来是有一点洁癖的，她的生活很坎坷，听说年轻的时候丈夫一病不起，她就誓志守节，绝不再嫁。是由于礼教的束缚还是由于夫妻恩爱，就不太清楚了。她是吴家的远亲，论辈份属于我母亲的姨祖母之类。但我还是通称她七老太太。由于多年孤寂的生活，精神上受过巨大的刺激，她得了忧郁型的精神病，但又有时表现为燥狂。这平常是看不大出来的，很好静，很安详，对旧文学、旧诗词是有一些修养的。她常念叨着两句诗：“白玉窗中闻落叶 应怜寒女独无依。”诗句不知出于何人的手笔。

那时她就住在吴家的老宅子里。吴家老宅也坐落在吉家胡同中部的转角处。宅子是由三个不规整的小院组成的，各有门相通。西院和南院都空着，七老太太住在中院三间北房偏西的一间。东边的一间也住着一个寡妇，是我外祖父的三弟媳，有一儿一女，就是我的七舅和七姨。她们都是靠收房租度日的。偌大的三个院子和几十间房子经常锁着，除了一

个老听差，就住着这两家寡妇，这里真是荒凉、空寂、幽静而神秘，显得毫无生气。1934 年秋，我却一个人搬了进来。

那是由于我的母亲到南方去了天津只剩下我一个人。搬到这外祖父的老宅来是希望得到一些照应的。七老太太的痼病是时犯时停的。她常对我说这院子是有狐仙的，常常半夜出来在院子里走动，有时显现成人形，是个女身，有时穿一身白衣服在她的窗根下来回走动，她还听得见她衣履丝丝的声音。……她说得严肃认真，绘声绘色，却令我毛骨悚然……“你别怕，她不会害你，是在暗中保护你呢。我每逢初一、十五都给她在院子里烧香上供，有时供桌上的水果转天就不见了。狐仙喜欢吃苹果和葡萄。……”她说的是为了叫我住在这里不要害怕，但却增加了我的神秘与恐惧之感。一到夜晚便战战兢兢，一片落叶的声音也使我胆战心惊。

记得我搬来的第一天就把我安排在西院三间南房里，这是个大客厅，是老宅三个院子里较好的一间，东墙上有一面大穿衣镜，两边镜框里镶着一副清末科状元陆润庠的楷书对联，总之，多年没人居住了，显得十分空旷，幽暗，我就睡在当中用两张八仙桌搭成的“床铺”上。这天晚上那个留守的听差张大，是个最见钱眼开最最狡猾的家伙，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孤独一个人，又是刚刚离开温暖的家和母亲的怀抱，真是害怕极了，又加上那夜秋风飒飒，前面隔扇玻璃被风吹得零零乱响，一只暗淡的电灯在空中摇摇晃晃，真是鬼影绰绰令人毛骨悚然。我把头蒙在被里，不能入睡，屏着呼吸，忍耐着时刻。不知怎的偶然伸头外望，我却真的看到了院子里有个“狐仙”，一个穿白衣女人，在窗前走来走去，吓了一身

冷汗，至今思之，犹有余悸。这是半生中永远磨不掉的记忆中的最最恐怖的一夜。

转天和七舅谈起我这一夜的遭遇，七舅笑了：“这大约是七老太太半夜里起来去看望你吧。”原来，七老太太在瘧病发作时，常常一个人深夜在院子里徘徊走动，嘴里还念念有词呢。我想也许就是那个断句：“白玉窗中闻落叶，应怜寒女独无依”吧。

回忆往事，所以使我深深怀念她，是因为她那时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对我是个启蒙。每当读到一些闺怨的诗，她的感情特别哀伤，“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大约引起了对死去的丈夫的伤逝之情。旧社会妇女悲惨的处境，使我深深同情，记得我在改编鲁迅的小说《咸亨酒店》写到单四嫂子时脑子里曾经浮现过她的影子。她与单四嫂子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想到她时，便调动了我笔下的感情。

（五）难得糊涂”的风波

我在上初中时，由于母亲赴皖，借住在外祖父吴家老宅。原想是一时权宜之计，但一住却是几年。原因是母亲到安庆后，一病不起，死在异乡。天津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老宅是吴家的公产，但置办者却是我的外祖父吴金彪，母亲是他的长女。提起这个外祖父来确有一些值得一书的奇人奇事。在那些杀人不眨眼又腰缠万贯的北洋军阀中，也算个少有的人物。他行伍出身，袁世凯培植个人势力组织新军，在小站练兵时，他从伍长升迁为“协领”、“统领”之类的小官，

后来又保送进了保定“武备学堂”。这是培养直系军阀的地方。他曾与齐燮元、陈光远、王怀庆等督军、省长是同学，是直系军阀的嫡系，由于他不事钻营，不善逢迎，只以旅长的身分作了 9 年的赣北镇守使。这是他一帮同学中最低的职位了。人们管他叫吴小辫，也叫吴疯子。母亲生前曾以夸耀的口吻称颂他在九江任上的几件事。北伐前，九江抓到了几个潜伏的革命党人，他曾亲自提审，对那些青年破口大骂：“当革命党？你配嘛？我看你也不像，老老实实回家念书去，滚吧！”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给放了。他事后说：“都这么年纪轻轻的，咱不作缺德事。”九江是四川烟土航运上海的必经之路，贩毒者也向路经的口岸的官方送钱纳贡，以求顺利通过，这是惯例，但钱送到他面前，他却说：“这是魔鬼的勾引，拿了它，死后不能上天国的。”当时他已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了。母亲说：“他傻，光顾自己沽名钓誉，可他的下属们却发了横财。”他向教会捐款，从不吝惜。他与冯玉祥将军是至交，冯也是基督徒，在一本什么《……证道》的书中，曾赞誉过他，他在九江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署名“荫园”，传说那是三国时周瑜或陆逊作水军都督的旧址，我三四岁时曾随母亲在这里住过几个月，当时在园里他收养了四十几个孤儿寡母，都认作义子，母亲说他一生就是惜老怜贫。天津的老宅也是他收养孤寡的地方。可是那时只住有三姥姥和七老太太两家。

有一次他到天津来，我曾见到他，70 多岁的老人，大个子，身体壮健魁梧极了，穿一件宽大的黑布大袍，却在中间胸口处开了个竖口子，里边缝了个大口袋，他从口袋里掏出许多变魔术用的小道具，津津有味的给我变起来，哄我一笑，

真像个老小孩。

大约是 1939 年他死在上海。他是从九江到上海来治病的。住在上海八仙桥红十字医院 因我的四姨——他的四女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科毕业的，当时在红十字医院任护士长。一天，他自知不起了，叫我的胞兄梅熹借来 16 厘米的小电影机，给他拍些影片，以便将来给不在上海的子女看。那天，也许是回光返照吧，他嚯地从床上坐起，撂开袖子，给我们看：“你们看，胳膊上的这块疤。是我当年割肉疗亲，虽然没救了老娘的命，这是孝。”又撂开裤腿，露出大腿上的一片疤痕，他拍着说：“这是甲午海战时炸弹片打的，是打日本鬼子啊，这是忠。我忠孝两全，死也闭眼。”他曾说甲午海战时他中弹落水，失血过多，昏迷后，在大海里飘浮了两天两夜，终于被潮水冲上岸来，又苏醒了，拾了条命。他说：“多做好事总有好报，你们记住，老天有眼啊。……”

对于这位老人我常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在这里费了些笔墨，也算为他立传吧。他对我以后的生活与工作，无论遇到顺境与逆境都能看得超脱些，是颇有影响的，因为我总想起那次他从怀里掏出道具为我变戏法时那种自得其乐的神情。

在吴家老宅借居的日子里，也使我尝到人生的另一种体验，七老太太虽然有时疯疯癫癫，但心地善良。而那位三姥姥却是心胸狭窄，待人尖刻，她的儿子、我的七舅比我大不了几岁，人也挺朴实憨厚，我们是亲密的小友，他学习的不太好，常常受三姥姥的斥责，骂他笨，骂他糊涂，也是恨铁不成钢吧。一次我们俩欣赏郑板桥的书法，他叫我写几个字，